



多音集

『人生足迹』——『回音集』的续集

金向明

编

多音集

——《人生足迹》《回音集》的续集——

金向明 编著

二〇一〇年五月

复音集

《人生足迹》《回音集》的续集

目 录



编著者的话 /1

一、《一生中永记不忘的人》 /7

金陈廉 /7

林霞飞 /10

孟宪章 /15

林 琳 /21

刘 康 /27

附（一）刘康部长长子刘寄星先生第一次复信 /34

附（二）刘康部长长子刘寄星先生第二次复信 /37

黄淑华 /40

二、《回音的回音》 /47

信函部分（共 52 件次） /47

电话纪要（共 16 起） /81

当面交谈（共 15 人） /87

三、《难忘峥嵘岁月稠》 /93

（一）“红色小宿舍”的峥嵘岁月 /93

“红色小宿舍”的由来 /93

红色书刊传阅的密室 /95

《多音集》

——《人生足迹》《回音集》的续集

编著者的话

这本书取名《多音集》，顾名思义，它是多种声音的汇集。该书汇编了既有连贯性又有独立性共十个部分的文章和有关资料。

连贯性是指这本《多音集》与拙著《人生足迹》、《回音集》这两本书是互相衔接，一脉相承的。

独立性是指该书有几个部分的文章内容，各自独立的体系，不同的编排和审视的角度，代表着另一种声音。但从整体上讲，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是不可截然分割的。

现将这十个部分的文章标题和内容做点说明。

第一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一生中永记不忘的人》

这部分共写了六个人，他（她）们是我的亲人，学术论争的前辈，工作中的直接领导，在《人生足迹》一书中，都提到过。由于经常萦绕于怀，铭记在心，使我时刻思念，特作专门的忆述。健在的祝福健康长寿，欢度晚年，向百岁进军。仙逝的，表达我对他（她）们的无限缅怀和追思。

第二部分，文章标题是：《回音的回音》

自拙编《回音集》——『人生足迹』评说及其他一书于2008年10月赠送后，陆续收到各方的来信，打来的电话和当面交谈，关心、鼓励之情，令我感动，也是对《回音集》一书的反馈与赠言。我又分类整理，汇编一本《回音的回音》小集子，作为该书的组成部分，先后衔接，是名副其实的续编。

第三部分，文章标题是：《难忘峥嵘岁月稠》

今年是上海解放六十一周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从事学运斗争的峥嵘岁月。一是具体地、形象地再现了青云路“红色小宿舍”的革命斗争情节；二是在宝山路宿舍半年时间里，开展不公开露面而是撰写革命进步文章，揭露反动统治的斗争活动；三是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斗争历程。也就是说：从国统区学生运动第二条战线转移到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条战线的革命历程。

第四部分，文章的标题是：《部队举办文化速中是我国建军史、教育史上的创举》

《多音集》编入这篇文章，有其内在联系。我在部队工作共十五个年头，其间在文化速中长达十年之久（1952年到1962年），感受最深。当年文化速中以正规的课堂教学形式，提高部队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是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一项基础工程。

入学对象是各级指挥员，又是成年人，经历了革命

战争的锻炼，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好、求知欲望强等特点与优点。经过速中一定期限的学习，提高了文化科学水平，开创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的一条捷径，它为我国成年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五部分，文章的标题是：《爱国爱校暨南情“渝讯”传播连四海》

我的母校暨南大学已有一百四十年的悠久历史了，它是我国最高华侨学府，培养出来的莘莘学子，遍布全球。因为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就有暨南人。

重庆暨南大学校友会人数不多，但创办的会刊《暨南渝讯》在海内外有点名气。这篇文章着重记录了海内外暨南人对《渝讯》的关爱、鼓励、支持与期望。现已出刊 218 期，每期八千字，小小《渝讯》，大大影响。身为主编，有此硕果，深感欣慰。

为了弘扬爱国爱校的暨南精神，传承忠、信、笃、敬的暨南校训。宣传暨南、宣传重庆。一息尚存、矢志不渝。所以，《暨南渝讯》一定坚持办下去，一定越办越好，一定不负众望。

第六部分，文章的标题是：《祖孙书信交往显真情》

我们这一代老年人，时常在思考一个普遍性、社会性的共同问题，就是代际之间的沟通问题，也就是如何与第三代沟通、互动、共进的问题。

我有三个孙儿、一个外孙，除外孙相处时间较多

外，其他三人进大学、出国留学、参加工作后，一年半载难能见面，很少交谈，缺乏共同语言。在此情况下，我试图与远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孙女金蕾，通过书信交往，加强联系，加深了解，增进亲情。每当我读了孙女的回信，深受感动，她成长、成才、成熟了，懂事、明理了，毕业后该知如何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实践证明了代沟是可以破冰的，是可以构建和谐、平等、互动、关心、共进的祖孙关系。

第七部分，文章的标题是：《晚年要学习 不忘兴 国事》

这部分表明自己对一些焦点、热点问题的思考。它包括（1）对“发展”这个“硬道理”“第一要务”的思考；（2）对“适应”问题的思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应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反作用于“经济基层”；（3）对“改革”的思考，指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自主创新之路；（4）对“全球化”的思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各种问题、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面对“两个不可避免”，要举全国之力，发挥各方力量，未雨绸缪，制订应对之策。

第八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二次离退献余热 未 减当年勇》

这部分记述了离开市老年大学之后，三年来在力所

能及情况下再献余热。

一是编撰了三本书《人生足迹》、《回音集》、《多音集》近45万字。

二是参加重庆新四军研究会的活动，完成了撰写与编委任务，完成了研究会举办的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撰稿任务，介绍我市知名书画家入会，壮大了研究会专业人才队伍。

三是离开市老年大学后，为校本教材的建设，不遗余力，完成了三个专业教材的审阅工作。

四是继续主编重庆校友会会刊《暨南渝讯》，三年内出刊46期，该刊创办于1993年4月，已出刊218期。

以上编写撰稿总字数近百万字，是自己优势的最大发挥，也是老有所为的硕果。

第九部分：文章的标题是：《“老年教育文选”给读者留下令人惊讶的思考》

该文首先肯定一批离退休下来的老领导，老干部为创办老年大学，发展老年教育所作出的无私奉献的业绩，他们总结的经验，撰写的论文，老校长的老年教育回忆录等，都是共同的社会精神财富，尤其是一批专家、教授为建设中国特色老年教育学这个巨大工程而努力探索、创新、使人铭记不忘。

笔者阅读了一本《老年教育文选》，令人惊讶。将该文编入《多音集》是代表另一种声音。意在引起关

注；特别是老年教育战线上的同仁，端正文风、保护知识产权，谴责个别剽窃行为。当前教育界、学术界时有披露，这股歪风也吹到老年教育战线上来，不可勿视。（注：正文中去掉该部分的文章内容，请见《编后》中的说明。208-209 页。）

第十部分：文章的标题是《夕阳无限美 老骥共相勉》

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章节，是代表老年心声。写信的老年人，都是八十以上的耄耋老人。有我当年部队的老战友，老年教育战线上的老领导、老朋友（也是老年知音）、暨南校友中的老学长、中学读书时期的好学弟，还有我少年时代同吃一锅饭长大的表兄。共同的愿望：健康养生，量力奉献，欢度夕阳红。

以上编著的话，实际上是引言，对《多音集》一书的内容，结构的说明。夕阳无限美，不怕近黄昏，让我这个耄耋老人愿同作者、读者、校友、战友、亲友共享，共勉、共进吧！

金向明二〇一〇年二月于重庆市教科研究院

——一生中永记不忘的人

今年，我八十三岁了，已步入高龄老人的行列。回首自己的一生，撰写了一本《人生足迹》和汇编了一本《回音集》——《人生足迹》评说及其他。将此生作了较为全面的反映和补充、佐证。但书中我永记不忘的几个人，经常萦绕于怀，铭记在心。在此，按接触的初始阶段的时间为序作以下专门的忆述。

金陈廉

她是我的亲姐姐（1924年—2000年）享年76岁。

她大我三岁，从小学读书起，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中学时代，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家乡（温州乐清）被日寇侵占时，参加乐清学生抗日武装工作队，大学时代，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学运斗争的骨干。解放初期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后到杭州一所中学任副校长。

在我青少年时代几个关键时刻，姐姐对我的启发、教育和帮助，至今铭记不忘。

一是当我读高小二年级时，因少年顽劣，惊动邻里，被关在一间小屋里，面壁思过，将近一个学期没有去学校读书，全靠姐姐的辅导。我一边改过自新，一边完成课业规定的学习任务。最后参加高小毕业考试，成

绩合格获得了毕业证书。

二是初中一年级时，因乐成初中运动场被县国民兵团强占，不让我们同学上体育课之事，我们发动、组织了全校同学请愿示威游行，维护了学校权益和正常教学秩序，“丘九”（指学生）战胜了“丘八（指当兵）”。但学年结束时，校方迫于政府的压力，要将为首的闹事学生开除出校。后校方以变相处分的办法，我遭到了勒令退学的处理。也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复习好功课，转学插班考入了温州中学初二年级。从此，姐弟同校，她读高中，时常给我一些革命、进步书刊传阅，使我首次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

三是姐姐带领我参加乐成中学生假期工作队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与周庆霭同学负责主编抗日油印小报《手溜弹》，介绍、报导抗日将领的战斗业绩和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歼敌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手溜弹》每期刊出张贴后，城镇居民争相阅览，受到了他们的欢迎和喜爱。我还参加学工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和文学研究社的讲座活动，还广泛传阅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香港出版的《救亡日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和革命事迹的教育。

四是一九四八年上海“八·二六”事件中，姐姐得知我被暨大反动校方开除，上海国民党特刑庭的传讯，专门从杭州来上海找我，商定随姐姐到杭州，通过浙江

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业荣同志的关系，安排去苏北解放区，我在杭州等了几天，因形势紧张，联系的线路暂时中断，待交通恢复后再通知我。于是返回上海，寄居孟宪章先生家中，正在这个时候，巧遇从豫皖苏来沪动员青年学生参军的地下党陈超同志，叫我不要等杭州方面的通知，带领我们四人（计上海新专孟庆铎、民治新专刘世哲、交通大学林霞飞和我）奔赴豫皖苏，参加解放军，因目标是一致的（后苏北交通恢复，姐姐再次通知我时，已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了）。总之，姐姐对我的关怀，永记难忘。她不单是我的姐姐，还是良师、益友、同志，对我的人生起步，起到扶持、指引的作用。

五是全国解放时，我经历了淮海、渡江和进军大西南等战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转业地方后，一直在重庆工作，姐姐一直在杭州工作，虽远处杭、渝两地，我们都从事普教事业，保持书信来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反右派斗争中，都能相安无事，唯独在“文革”中，这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年代里，我俩都受到了政治迫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挂黑牌子游行，身心受到摧残（姐姐发生于当年参加乐清学生抗日武装工作队的事，我发生于当年没有同宣崇、文达一起到浙南游击区根据地的事）。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属于“走资派”（姐姐在一所中学担任领导，我在县文教科担任领导）。一在杭州、一在綦江，其遭遇何其相似。我恢复工作后，回家探亲路经杭州看望姐姐一家时，谈起“文革”

初期霞飞遭受严重摧残，以后病逝綦江，是我一生的不幸，全家遭遇最大的灾难。也谈到“文革”中发生一些啼笑皆非之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获得新生，我们头脑也清醒了，也开始真正觉悟了。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应该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是时代的不幸，党的不幸。应当振奋精神，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事业开创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姐弟劫后重逢所取得的共识。

林霞飞

又名林素兰，她是我的同学、战友和革命伴侣，享年47岁（1929—1976年），英华早逝，使我悲恸不已。

我与霞飞，初识于1944年暑假，她随其长兄林泰等五位同学来到乐清我家，参加在乐清举行的篮球友谊赛。她初次到我家，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在乐清只要了三天他们就一起回温州。不久，温州被日寇占领，温州中学迁往泰顺江口，她与长兄到泰顺报到。我这个学期没有去学校读书，但与她建立了通讯联系，首次通信向她介绍了乐清一些同学参加抗日武装工作队的情况，希望她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不要死读书，多阅读课外进步书籍，提高认识，跟上时代的步伐，社会的发展。这次通信，为今后接触，打下了思想基础。

我们接触，亲近乃至关系的建立，以及特殊情况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妇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温州中学读书阶段。1945年8月日寇投降，温州中学从泰顺江口迁回温州道司前校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我读高三上期，她读高二上期，我们两人之间，接触较多。如向她介绍革命、进步书刊；为她组织的读书会讲解有关问题；参加我们读书会举办的讲座……等等。通过上述活动，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与感情。

（二）大学读书阶段。我于1946年8月考进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她尚在温中高三年级，时有通讯往来，经常寄递革命、进步书刊。她于1947年8月，考进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从此，我们两人在上海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双方都积极参加学运斗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的思想感情基础也更加巩固，每月有1—2次相聚，交流在学运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这时，我与素兰的关系已经明确，双方家庭也赞成。并于1947年寒假在温州日报刊登了订婚启事。

（三）共同离开上海奔赴解放区阶段。我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被学校开除，被上海国民党特刑庭传讯，不能在暨大立足，经地下党陈超同志从豫皖苏来沪动员青年学生参军。我们就一起在陈超同志的安排下，亲自带领奔赴解放区，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二千余里，从上海经蚌埠、颍上到达豫皖苏四分区驻地安徽吕大寨。这一月多的奔波，按照地下党的安排，我与霞飞改装打扮为商人，途中虽遇到惊险，由于陈超同志应对得体，化险为

夷。等候接头人的时间虽长，总算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一路上，尤其是过了几天游击队的生活，白天隐蔽、夜晚转移，是参军前的一次部队生活锻炼。

（四）特殊情况、批准结婚。在豫皖苏四分区时，我分配在分区政治部宣教科任见习干事，霞飞任政治部见习会计，共同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审查蒋军战俘的工作。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分区地方武装上升主力，编为二野十六军四十八师，我俩都奉调到野战部队，当离开四分区前夕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分区党委批准了我俩申请结婚的报告。记得当年分区政治部黎钊副主任亲笔写的“特殊情况，批准结婚，并祝幸福”十二个大字，至今还记忆犹新。按当时部队规定结婚条件是“二八五团”（即28岁以上，五年军龄、团级以上干部）。从此结为革命夫妻，政治部还举办了既隆重又简朴的结婚仪式。

以上就是我和霞飞从相知相识，正式恋爱、宣告订婚和最后结为伉俪的全过程。

此外，我俩在解放战争年代，三反运动时期和文革灾难中，也历经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事。

一是界首集结，大军南下，江北行军，经受考验。

结婚后的第三天，我俩就去界首四十八师政治部报到，我任命为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霞飞任命为师后勤处会计。经过一周左右时间的整训，大军开始南下，我随部队一起行动，霞飞等几位女同志一律留在后方，编

入中原女子大学（实质上是家属队）。江北行军，途次三河尖时，正遇上大雨倾盆、颍河水涨，道路泥泞，无法行走。由于部队行军，风雨无阻，爬也要爬着走，在此情况下，最可怜的是我，满身泥浆，满脸泥土，宛如一个“泥人”，在三河尖几里路，跌交几十次，结果掉队好几里路，只好与收容队同志一起。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看到霞飞同志，身背算盘、手拿拐杖，一步一跌地到收容队来。我俩人又惊又喜（她原留在后方中原女子大学，后领导提出，凡年轻体健、无病伤、无小孩牵累的，可以回到前方与原单位一起行动。就这样，她与朱苇、吴天明三人回到四十八师）。她见到我就说：“跌交九十九次，差一次就突破一百了。”浑身全是黑泥浆，收容队又增加了一个“黑泥人”。幸好我们年轻，身体好，休息之后，雨过天晴，第二天就赶上了部队，回到各自战斗的岗位。三河尖，这个专门考验人的地方，给我俩留下了难忘的“跌交”纪念。

二是我在“三反”运动中接受审查教育时，霞飞对我的信任与关心。

一九五二年部队开展了“三反”运动。当时身为政治部秘书，主管政治部办公室，正值征粮剿匪高潮。各团从剿匪中缴获的金戒子、银元和钞票等都要先送分区政治部办公室由会计逐项登记统一保管，一个月清理一次，造册送交后勤部门，都要经过我签名审核，在这项工作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送来的战缴物资只登

记个数、件数，没有登记重量，金戒子几个，究竟是几两几钱几分，谁都说不清楚；二是清理经费时，发现帐面与现款不符，多出 200 万元（即现在 200 元），是登记漏掉或其他原因也说不清楚，因而作为主管人，签收审核就脱不了手，成为“三反”运动中的重点对象（当时称大老虎）。当时搞的群众运动，过火行为，时有发生，思想上也产生抵触情况，被送到警卫连禁闭室关押。在关押期间，不准探视。霞飞同志对我是充分信任的，由保姆抱着不到四个月的儿子泸光来看我，因运动开展后，一个多月没有见过孩子，心情非常激动、高兴。请保姆转告霞飞，一定坚信组织，终归还我清白。不久，川南军区组织工作组下各分区纠正“三反”运动中的违纪作法，不再关押在警卫连禁闭室了，采取谈心、交待政策、调查取证、回答提问等方式。我的问题很快搞清楚了，属于工作上缺乏经验（指登记战缴只有个数没有重量）和自作主张缺乏事先汇报无组织观念的问题（指多出 200 万元由会计以分区政治部名义送交泸州专区救灾办公室作为救灾款）。《人生足迹》一书中“部队三反运动的教育与思考”一节已作了较全面的记述（86—89 页）。“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和霞飞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一起调到西南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工作了。

三、文革期间，霞飞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病逝綦江。

当年綦江造反派经常揪斗“走资派”，有一次我被